

【论 文】

中蒙划界史迹初探（上）

——“同志加兄弟”的博弈¹

刘晓原²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即面临着同北方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复杂的双边关系。本文指出，历史遗产、意识形态、国际环境、民族关系等错综的因素，伴随着脱胎于清代统属体制的中蒙关系发展，使之从一种彼此界限不明的新型国家关系架构，经历由「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到相互猜忌、仇视的变化，终归落入一般现代国家关系的窠臼，双方在1962年签订边界条约。在此过程中，对再现历史记忆的孜孜追求、对国际大同的朦胧向往、对冷战国际阵营利益的有限服膺，以及各自与苏联关系的差异，导致中蒙政府对双边关系的走向和正常性各有理解。1962年划定边界，标志着中蒙关系在近现代领土属性转型的意义上走入正轨。同时，在双方各自秉持的政治理念里，这条边界线体现更多的，却是相互加深的敌意。

关键词：领土属性转型；兄弟国家；中苏分裂；中蒙边界；民族关系。

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面临的所有边界问题中，中蒙边界问题十分特殊。与中苏、中印、中越等边界不同，中蒙边界并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冲突。然而，中蒙边界问题具有中国同所有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所不同的鲜明特点。首先，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方才出现的边界问题，开始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其次，这个问题在1949年以后包含了极其复杂的边界理念，集国际、党际、族际（民族/族群）的内涵于一体。最后，1960年代中苏分裂以后，中蒙边界成为冷战时期最具战略意义的边疆地区之一，不但苏联陈重兵于蒙古，内蒙古自治区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中国国内唯一重划区界的省区。

由于材料匮乏，比之于中苏、中印、中越等边界问题，中蒙边界问题较少受到学界的注意。本文所反映的，只是对中国、蒙古、俄国档案材料的初步梳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只能点到为止，观点也不成熟。全文的着力点，在于拓宽对中蒙边界问题的理解，试图说明中蒙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中、蒙、苏三国政府在冷战时期的外交决策，更是近现代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和东亚国际关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官方研究

尽管学界对中蒙边界问题研究较少，但是官方在不同时期还是做了详尽的内部研究。目前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的研究数据有三种：第一种是1963至196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织有关军区和省区党委编纂的中苏、中蒙边界问题的多卷资料；第二种

¹ 本文刊发于《二十一世纪》2020年6月号第179期，《通讯》转载得到《二十一世纪》杂志授权。本文所利用的俄国、蒙古档案，是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沈志华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15@ZH009）第二期子课题“蒙古国中蒙关系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同仁整理、翻译的。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王浩教授、刘迪南副教授和袁琳讲师，上海大学历史系哈日巴拉讲师，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晓亮副教授、金泉和白林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崔海智副教授、谷继坤讲师、乌仁其木格助理研究员等。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安然为整理本文涉及蒙、俄档案的批注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² 作者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大卫·迪恩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

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在 1989 年编辑的数据，其时改革开放已历十年，冷战也接近尾声，但中苏关系尚未解冻；第三种资料成稿于 1993 年，编辑者的背景不详，但从资料的“内部”来看，显然也有官方背景¹。这些数据对于中蒙边界形成的描述是一致的。

简言之，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中蒙双方对于边界线有不同看法，蒙古主张以当时的苏制地图为准，而中国国民党政府则坚持以中国对内、外蒙古的原行政区划为准²。中蒙边界的最后划定，完成于 1962 年 10 至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举行的边界会议，以及 12 月签署的《中蒙边界条约》。当时双方各自的“建议线”基本一致的边界约为 2,450 公里。通过两次会谈，双方解决了有争议的三十二个地区的归属，共涉及 16,329 平方公里；划归中国的约 5,620 平方公里，占争议地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划归蒙古的 10,709 平方公里，是争议地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弱。《中蒙边界条约》签订以后，两国边界全长为 4,672.7153 公里，同蒙古临界的中国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甘肃和新疆，其中内蒙古与蒙古的边界为 3,105.7683 公里。这些数据表明，解决争议的依据是历史和当地居民的经验，双方磋商后各自做出了让步。至于为甚么中蒙两国在领土面积上达成如此结果，以及这些得失各具甚么样的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在下篇的有关讨论里会有涉及。

在这些正式、详尽的官方研究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还有研究中蒙划界问题的必要？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上述数据的编纂基于从 1960 到 1990 年代国内外政治环境几次急剧变化而衍生的不同政治理念。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研究对中蒙边界问题的发展并没有提出一个历史的解说。其次，这些研究依据的只是中国单方面的信息，对蒙古、苏联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缺乏实证的研究，甚至对中方的情况也只是做了有选择的说明，并没有展示有关历史过程的全貌。随着相关国家档案的公开，现在则可以对有关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以下是现存官方研究中，对有关历史过程提出的几个相互矛盾的解说例子。

第一，对外蒙古独立的描述。1960 年代的数据完成于中苏分裂时期，对苏联有强烈的谴责意味，称：“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苏联竟背着中国人民于 10 月 11 日将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版图。……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人民，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名义上让它独立，实际上归苏联控制”。³ 1989 年的数据则选择了一个更早的时间点，结合了中共党史叙事，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正当性，称：“1924 年 11 月 8 日，外蒙古召开人民大呼拉尔会议，正式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未予承认。后来，中国共产党于 1935 年发表宣言（即《三五宣言》）认为，外蒙古独立符合外蒙古人民摆脱反动统治与民族压迫的正当愿望”。⁴ 1993 年的数据基本上回避对 1921 年以后的外蒙古独立作出价值判断，而是只讲史实，对从清代到中共建国这段时期的外蒙古事务，作了较详细的综述⁵。

¹ 第一类为内蒙古军区编：《内蒙古军区兵要地志》（内部发行，1963）；《蒙古人民共和国兵要地志（中苏、中蒙边境数据第三分册）》（内部发行，1964）；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内蒙古军区编：《中苏中蒙内蒙古中段边境我区情况（中苏、中蒙边境数据第九分册）》（内部发行，1964）；总参情报部编：《中苏、中蒙边境情况汇编》，下册（内部发行，1964）；沈阳、内蒙、新疆军区编：《中苏、中蒙边境苏蒙边防军情况（中苏、中蒙边境数据第五分册）东段》（内部发行，1965）。第二类为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编：《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内部发行，1989）。第三类为齐焕祥、章文权主编：《八千里边防》，内部数据（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² 当代中国人习惯沿用清代用语，称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为“外蒙古”，以别于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本文叙述照例，但凡用“蒙古”处，皆指独立的蒙古国。

³ 《蒙古人民共和国兵要地志》，页 21-23。

《内蒙古军区兵要地志》，页 7；《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页 3、6-7；《八千里边防》，页 34-37、41。1960 年代资料的说法与毛泽东 1964 年 7 月接见日本一个代表团时的讲法基本一致，而所谓中国坚持以内、外蒙古“原行政区划为准”的说法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详见下文。

⁴ 《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页 5。

⁵ 《八千里边防》，页 30-34。



第二，对中蒙边界属性的描述。1960年代的资料特意指出，在1949年以后，中蒙边界的属性发生了急剧转变：“四十多年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领导下，团结外蒙古人民在争取人民革命胜利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泽〔泽登巴尔〕修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以后，蒙古人民革命党已蜕化成修正主义的党，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倒退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专政的国家。……蒙古已成为苏修的附属国和殖民地”¹。换言之，在1960年代，中蒙边界问题是被置于“阶级国家”的理念框架里来理解。在蒙古“变修”以前，中蒙边界是两个“兄弟国家”或“兄弟党”之间的连接；在蒙古“蜕变”为中国的“阶级敌人”以后，中蒙边界也就变成了一条“阶级斗争”的战线。在这种理念下，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边防问题，而是“敌我”之间的阶级力量对比。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甚至包括了对中蒙边界的中国一侧边境居民的“阶级成份”考虑²。数据表明，中方在1960年代是有打仗的准备的：“在目前修正主义份子大肆反华的情况下，谁要想凭借武力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仅在苏联人民中通不过，就是在广大士兵群众中也是通不过的。今后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我们只有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作好准备，以便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³。

相比之下，1989年的资料则反映了文革以后政治理念的变化，不再提及“阶级斗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回溯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资料描述了1950年代中共在边境地区“慎重稳进”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当时中蒙两国互为“兄弟国家”在边境合作的情况。1950年代中蒙的边防安排，并不是针对对方，而是为了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对于1960年代双方出现的紧张局面，数据是这样说的，“由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而蒙古“跟随苏联反对中国”；“苏蒙两国调兵遣将，进驻中苏、中蒙边界前沿，虎视眈眈，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安全”；边境“由和平友好，‘互通情报，对付共同敌人’的边境变成蚕食与反蚕食，颠覆与反颠覆，策反与反策反，是非多端，气氛敌对的边境”。与此同时，中蒙边界的中国一侧，由于文革爆发和在内蒙古发生的“挖肃”运动，公安边防体系从上到下“全部解体”。数据特别提到，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苏、蒙为支持越南，以我为背景，在边界对面大肆进行军事演习，飞机、坦克、大炮昼夜隆隆，大有入侵我国之势”⁴。

至于1993年的研究数据，虽然产生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但是对边界问题已经采取了一种常态的国家管理的态度。数据表明，对1960年代被称为“阶级异己”的社会成份，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名称，即所谓“特种人口”（1949年）或“重点人口”（1951年以后）。在1973年以前，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都被视为“重点人口”；对此类人口的监管在文革时期受到破坏。1973年以后恢复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但定义发生了变化，即“侧重其现实表现，不再以其反动历史身份定论”，而凡是“现实危险份子”，均列为“重点人口”，进行“帮助教育或秘密监控”。至于与北方邻国的关系，资料指出，“80年代后半期，中苏、中蒙的国家关系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缓和状况，互相间的经济贸易有很大发展，敌对状态渐渐化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年“兄弟国家”关系已经恢复。在新形势下，苏（俄）、蒙的情报活动仍然频繁，民族主义、宗教势力的煽动渗透活动明显增多。蒙古仍有人散布“三蒙合并，建立统一的蒙古强国”一类的危险思想⁵。

¹ 《蒙古人民共和国兵要地志》，页23。

² 数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党、团员和民兵所占的人口比例，以及白俄、布里亚特人、哈拉哈人、喇嘛、四类分子、历史遗留的日美蒋特务和爪牙的人数，都做了详细的统计。参见《内蒙古军区兵要地志》，页11、79-80、97-98；《中苏中蒙内蒙古中段边境我区情况》，页2、27、42-43。

³ 《中苏、中蒙边境情况汇编》，下册，页32。

⁴ 《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页160-67、184、141-44、197、229-31、241。“挖肃”运动即“挖出与肃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运动，是文革期间发生于内蒙古的一场波及甚广的政治迫害。

⁵ 《八千里边防》，页270-21、313、375-76。所谓“三蒙”，即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第三，对 1960 至 70 年代中蒙边界紧张局势的解释。无论是中苏分裂时期的 1960 年代还是冷战结束后的 1990 年代，上述三种研究都把中蒙边界紧张的原因归咎于苏联和蒙古方面。一般的说法是，19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蒙古政府“跟随苏联反对中国”，一方面利用内、外蒙古的“民族和阶级的关系及地理条件，用对付敌人的手法，勾结我方具有严重地方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和反坏份子及其原来对付日本的老情报人员进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沿边境布置重兵，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¹。与此相关的是中蒙边界的划界过程，在 1950 年代中蒙友好时期，蒙方主动提出撤回边防军队，仅由双方的边防站处理沿边境上的偶发情况。但后来因为双方人畜越界和其他生产活动频繁引起的麻烦和误解，蒙方又在 1957 年提出划界。在以后几年中，由于双方对于边界是否在历史上已经划定意见不一致，划界谈判没有进展。在中苏、中蒙关系恶化以后，由于边界事件时有发生，中方在 1962 年 4 月提出解决划界问题，最终双方在 12 月签订了边界条约²。

这些在短短三十年内发生几次变化的历史叙述，说明中蒙关系和中蒙边界问题，即使在官方叙述中也还没有定论。有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解答，比如，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外蒙古独立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国民党/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都有各自公开和不公开的立场。那么作为历史研究，对这些立场应如何做出充分的说明和评判？又如，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蒙之间的边界属性？中蒙两国各自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转型，与之相关的国际大环境也几经变化。在不同时期，利益相关的中、蒙、苏政府和边境居民，历经中蒙之间若即若离的模糊状态、“有边无防”的友好状态、壁垒森严的敌对状态，以及循章管理的正常状态。因此，对不同时期的中蒙边界属性，显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般的“国家边界”。那么，这种发展变化反映的又是一条甚么样的历史路径？再如，1960 至 70 年代中蒙边界的紧张局势，为甚么并没有因为 1962 年《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而有所缓和？中苏分裂的大局势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是唯一原因吗？在中国周边的亚洲共产党国家中，蒙古真的与朝鲜、越南不同，只会“跟随苏联反对中国”吗？即便如此，蒙古对苏联的追随究竟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还是出于地缘政治或民族政治的原因？对于这些问题，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尚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本文提出的，只是对有限的档案文献分析后得出的初步印象。

二、“大蒙古”和“大中华”

所谓中蒙边界问题，可以从点、线、块的意义上来讨论。“点”即双方边境上存在争议的地点，“线”即对整条边界线的勘划，“块”即大片乃至整个族群/民族地域的归属。1945 年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与实际状态不符，由是无从解决“点”、“线”的问题。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定了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的程序，在法律意义上解决了“块”的问题。不过，当时的中、苏、蒙政府对边境的“点”、“线”问题各执一端，只能留待未来解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蒙双方对划界中的“点”、“线”问题仍有歧义，但是这些歧义并未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给两国、两党关系带来困扰的，反而是似乎已经解决的蒙古民族和地域的归属问题。换言之，中共建国后，使得中蒙革命政党的关系迭加于中蒙之间发展未久的国家关系之上；在一段时间里，源于共产主义的国家关系理念，对两国之间远未成熟的民族国家关系造成干扰；1945 年确定的中国对外蒙古独立的法律承认，又在“阶级解放”、“民族自决”、“兄弟党”、“社会主义阵营”等理念的干扰下变得不那么确定。这些干扰在两国领导人的观念中

¹ 《内蒙古军区兵要地志》，页 11；《蒙古人民共和国兵要地志》，页 22-23；《中苏、中蒙边境苏蒙边防军情况》，页 6；《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页 184；《八千里边防》，页 35。

² 《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页 6-7；《八千里边防》，页 35。

的具体表现，分别是对“大蒙古”和“大中华”的政治要求。

在中共建国之前，蒙古领导人一直怀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的梦想。在 1945 年中苏谈判期间，蒙古总理乔巴山（Хорл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就曾向苏联官员表示，蒙古“国家独立”的含义，也应该包括把内蒙古从中国人的压迫下解脱出来。最后，中苏谈判确定了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对其独立承认的程序。蒙古领导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他们所希望的苏联对华外交的结果，是实现苏联政府向来表示支持的蒙古“领土完整”，即内、外蒙古的合并，而不是蒙古“在现有边界内”，以投票的方式确认已历时二十多年同中国的分离。在苏联同蒙古领导人多次沟通以后，乔巴山等人勉强同意，中苏谈判对中蒙边界问题的谅解是“一个必要的，同时也是临时的步骤”，而蒙古真正希望得到的边界线，也就是内、外蒙古合并后的领土，可以暂时“搁在脑子里”¹。

但是，乔巴山并不想消极等待。在 1946 年 2 月同斯大林的一次会面中，他表示希望通过宣传鼓动，使中国境内的蒙古人脱离中国并加入蒙古。斯大林告诫说，这只能“悄悄地进行”，否则会引发同中国的战争²。1946 年初，针对在蒙古政界和民间广为流行的“未能实现的大蒙古梦”，苏联驻蒙古使团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据使团观察，所谓“大蒙古”思想，有形形色色的对文化、民族、地缘等因素的不同考虑。有一种极端的主张认为，蒙古国应该将边界推至长城一线，以便掌控大批汉族人口，作为发展蒙古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此时的乔巴山，对于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内、外蒙古的合并来建立一个独立自强的大蒙古国的想法已经幻灭。他实际希望的是让内、外蒙古的三百万蒙古人口一起加入苏联，使蒙古能够有足够多的人口和地域，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平起平坐³。

在其后几年内，围绕着内蒙古自治问题，蒙古、中共、国民党政府、苏联及至美国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⁴。1949 年后，蒙古政府依然保持着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的特殊关切。但是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里，没有关于 1952 年乔巴山去世以后“大蒙古”思想在蒙古继续流播的信息⁵。相反，俄国档案显示，在 1949 至 1950 年间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乔巴山关于内、外蒙古合并、“恢复统一”的思想是过时和落后的；为蒙古的发展前景计，只有尽早加入苏联，才能改变蒙古“大大地落后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状态。据称，后来成为乔巴山继任人的泽登巴尔（Юмжаагийн Цэдэнбал）也有这样的想法⁶。但是在 1956 年 4 月蒙古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保持蒙古的独立状态。这或许表明蒙古党内对国家前景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⁷。至于 1949 年以后，在内蒙古是否仍然存在着“大蒙古”思想，根据目前的材料尚难定论。文革时期对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和所谓“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揭发材料”，自然不足为据，但是 1949 年以后内蒙古的民族政治问题，尚待仔细研究⁸。

¹ 《伊万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1945 年 7 月 5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6，оп.7，п.38，д.560，л.4-5；《伊万诺夫、普里霍多夫致洛佐夫斯基》（1945 年 11 月 22 日），АВПРФ，ф.0111，оп.27，п.193，д.2，л.15-21。

²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1946 年 2 月 22 日），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558，оп.11，д.352，л.87-90。

³ 该数字来源于档案，但当时内、外蒙古的实际人口应低于三百万。参见“Excerpts from a Report by the Head of the Soviet Mission in Mongolia I. Ivanov to Moscow”（12 January 1946），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2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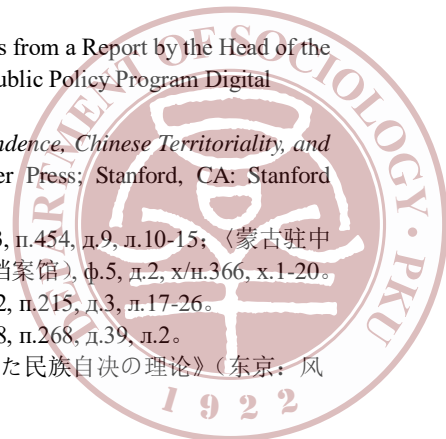
⁴ 参见 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⁵ 《契尔沃年科与斯拉夫会谈纪要》（1960 年 8 月 26 日），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4，д.9，л.10-15；《蒙古驻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报告材料》（1967 年 5 月 29 日），МУГХТА（蒙古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ф.5，л.2，х/н.366，х.1-20。

⁶ 《普里霍多夫给葛罗米柯的报告》（1950 年 9 月 13 日），АВПРФ，ф.0111，оп.32，п.215，д.3，л.17-26。

⁷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 年 7 月 28 日），АВПРФ，ф.0111，оп.48，п.268，д.39，л.2。

⁸ 参见杨海英编：《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础数据（4）毒草とされた民族自決の理论》（东京：风



与“大蒙古”思想相对的，是中共的“大中华”思想。“收复外蒙古”的理念在中共党内是长期存在的，在1949年和整个1950年代，中共领导人先后五次在不同场合向苏共领导人提出外蒙古问题。第一次是学界所熟知的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在西柏坡的谈话¹。至于其后几次包括1950年毛泽东访苏期间、1954年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ев）访华期间、1956年米高扬访华期间，以及1957年周恩来访苏期间的谈话²。在1972年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确认，在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谈判期间，中方提出了要把蒙古包括在中国的“大家庭”里，可是遭到了苏方的反对³。关于1956年4月米高扬访华期间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情况，俄国的解密档案有所披露。当时，周恩来向米高扬提出，两党在1949年2月就外蒙古问题交换意见时，斯大林的观点和“党的原则”不一致。刘少奇则表示，“中国人民对蒙古脱离中国很痛心，……中国人民把蒙古看作是和台湾一样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和刘少奇表示，并不是现在就要把蒙古合并到中国，这可以留待以后再说，但是此时有必要表达出“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⁴。有关1954和1957年谈话的直接史料，目前还没有看到。

每次中苏两国领导人就外蒙古问题交谈之后，苏方都会把谈话的内容传达给蒙古政府。因此对蒙方来说，中共领导人对外蒙古独立的看法从来就不是秘密⁵。但是，中方首次对外界公开自己的想法，是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的讲话。毛泽东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几个月后，总参在组织编纂中蒙边界数据时，基本上照搬了毛泽东的原话⁶。根据李丹慧的研究，在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此时中共针对苏联的安全战略思考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的谈话是中共第一次向外界宣示，中苏之间存在着领土争议。这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苏联引起了剧烈反响，并可能因此导致了当时中苏边界谈判的破裂⁷。

毛泽东的谈话对中蒙关系自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领导人就外蒙古问题与苏方交换意

响社，2012）。

¹ “Information Memorandum, ‘About the Claim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ith Regard to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30 January 196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098>.

² 乔冠华：〈周总理对苏联代办谈苏联占领邻国领土问题的提纲（稿）〉（1964年7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129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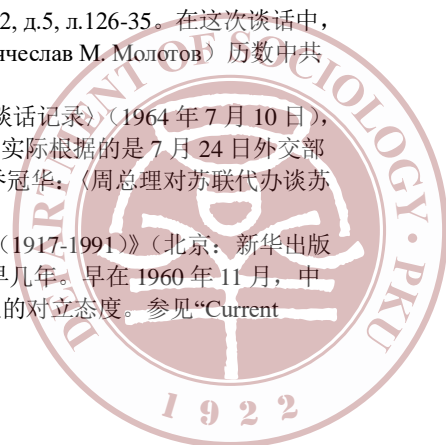
³ “Record of the Third Meet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Tanaka and Premier Zhou Enlai” (27 September 197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228>.

⁴ “Information Memorandum, ‘About the Claim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ith Regard to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30 January 196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098>.

⁵ 〈莫洛托夫与曾德会谈纪要〉（1958年2月7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40, п.252, д.5, л.126-35。在这次谈话中，蒙古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曾德向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历数中共领导人1949年以来提出的收复外蒙古的问题。

⁶ 〈毛主席接见佐佐木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1897-01；《蒙古人民共和国兵要地志》，页21。后者实际根据的是7月24日外交部整理过的毛泽东讲话，个别语句与7月10日的〈谈话记录〉有所不同，参见乔冠华：〈周总理对苏联代办谈苏联占领邻国领土问题的提纲（稿）〉。

⁷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载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503-12。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察觉还要早几年。早在1960年11月，中情局就注意到，苏共领导人的言论和中共媒体报导都显示出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参见“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 November 1960), 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2900100001-1。



见时，向来认为所谓外蒙古问题就是苏联的政策问题。现在所见到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 1960 年代中蒙关系破裂之前，双方直接讨论过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共领导人与蒙古领导人对话的基调，是推动“革命国家”之间针对帝国主义的团结。比如，蒙古政府代表团在 1952 年中国国庆期间访问北京，毛泽东在谈话中盛赞蒙古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毛泽东表示，“蒙古人民取得自由的时间长，有经验，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的后方有蒙古、其后还有苏联，蒙古、苏联、中国的关系更加团结了”，并进一步强调中蒙之间的共性，说大家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徒弟”¹。

在谈话中，蒙古代表团团长泽登巴尔提到：“1945 年战争后，国民党在承认蒙古独立的问题上，提出了全民公投的条件。所以举行了全民公投”。此话引出毛泽东的一个妙问：“蒋介石承认蒙古独立了吗？”随后的情形在蒙方的档案里是这样记载的：“对此，当尤·泽登巴尔说到‘蒙古人民都愿意独立’时，大家都笑了起来”。之后，毛泽东又加上一句更妙的评论：“国民党是听美国指挥的。他要求公投，是美国人的意思”²。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特意重申，他本人同斯大林在 1950 年初谈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承认了外蒙古独立。这次中蒙两党领导人有关外蒙古独立的对话虽然简短，但是双方的“笑”，特别是毛泽东的明知故问和指东打西的评论，却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到了 1960 年代，中蒙之间的革命团结不复存在，中共对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也不再一笑了之。在毛泽东 1964 年 7 月 10 日谈话公布以后，24 日，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应对苏方可能的询问的提纲，其基调是坚决批判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在欧亚大陆扩张领土，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奉行“列宁所痛恨的大国沙文主义”³。而中共对待可能来自蒙方的质询，则有一个方针上的调整。7 月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要求中国各驻外机构，在“蒙古大使可能在苏修授意下要求我澄清毛主席谈话中有关外蒙古部分”时，“不要与他纠缠，可说当时我不在场，但我认为，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决定蒙古的命运，中国是不满意的。如问中国是否要收复外蒙古领土，可答现在中蒙两国的关系大使是清楚的。不谈历史，不讲我们现在的态度，也不说将来如何，这样可保持很大主动权”⁴。

对历史研究而言，周恩来用模糊策略来“澄清”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以便在蒙古归属问题上保持“主动权”的做法，是了解此时中共领导人立场的一个左证。蒙古驻外使节是否向中方进行了询问，目前不得而知，但是蒙方的反应是毫不含糊的。据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外交部的报告，9 至 10 月间蒙古的报纸、广播以“按语”、“读者来信”和蒙古通讯社声明的形式，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了“恶毒攻击”，共计八十多篇。蒙通社的声明说：“中国领导人早就把蒙古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不断企图把蒙古变成中国的一个省，要取消蒙古的独立，这种企图同蒙古人民的凶恶敌人中国军阀、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事实上没有甚么区别”⁵。

其后，多半是出于孤立“苏修”的考虑，中国外交部指示驻外机构在蒙古归属问题上，对历史和现状要有不同的表态：“关于外蒙古问题，我可表示，外蒙古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为一系列的中俄条约和 1924 年中苏协议所肯定。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美英一起，背着中国人民，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名义上让它独立，实际上归苏联控制。在中国被反动派统治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对苏联的侵略，这样做尽管不对，

¹ 《毛泽东会见蒙古政府代表团谈话纪要》（1952 年 9 月 29 日），МУГХТА, ф.5, д.2, х/н.106, х.14-23。

² 《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时的谈话纪要》（1952 年 10 月 4 日），МУГХТА, ф.5, д.1, х/н.102, х.1-11。

³ 乔冠华：《周总理对苏联代办谈苏联占领邻国领土问题的提纲（稿）》（1964 年 7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1295-01。

⁴ 《外交通报》，第 95 期（1964 年 7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1897-03。

⁵ 《蒙古反华报导、广播反华声明情况》（1964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40-08。

在当时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苏共领导还坚持这种做法，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这是过去的事。至于现在，我们承认现状，我们同蒙古签订的边界条约就是证明。如果有人指责我企图剥夺蒙古独立，侵占蒙古，我可表示：现在剥夺蒙古独立和侵占蒙古的是苏共领导，不是中国”¹。

这样，毛泽东 1964 年谈话的一个附带效果，就是在谴责苏联在历史上分割中国领土的同时，表明了对外蒙古独立“承认现状”的立场。但是，只要中共领导人继续将外蒙古独立归咎于苏联的“说不过去”的做法，而不从蒙古民族政治要求的角度来接受作为邻国的蒙古，中蒙之间的历史情结便总是会处于一种扭曲甚至对立的状态。

进入 1970 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开始同西方国家合作以抗衡苏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在向西方国家表述来自苏联的威胁时，经常以蒙古为例，说明苏联对中国犯下的历史罪过和持续的恶意。例如，1984 年 3 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期间，邓小平在向他说说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时，讲到自己在小时候即从课本里学到，中国的版图是“桑叶”形的，而在苏联把外蒙古从中国夺走之后，“桑叶”不复存在了²。1989 年 2 月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访华时，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与外蒙古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话题。邓小平对布什说：“我希望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苏联把外蒙古从中国割去以后，中国成了甚么样子，我们的战略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记得中国的形状像一片枫叶。可是现在，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北边缺了一大块，枫叶被啃掉了”。邓小平解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就是利用这个战略态势，对侵华日本展开了致命的钳形攻势，而从赫鲁晓夫掌权开始，苏联又利用同样的态势对中国进行包围³。同年 5 月，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邓小平又向来访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С. Горбачев）指出：“通过包括雅尔塔协议和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人从中国抢走了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原属于中国的，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⁴。以上邓小平的讲话内容都是转译自英文文件，与原话可能有不符之处，比如“桑叶”和“枫叶”都异于中国近现代政治话语中形容中国“完整”版图的“海棠叶”。这种差异是邓小平自己造成的还是翻译过程造成的，并不重要，因为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前后一致的，反映的是 1949 年以后，特别是 1960 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个中共主导的“大中华”话语体系。

三、有债必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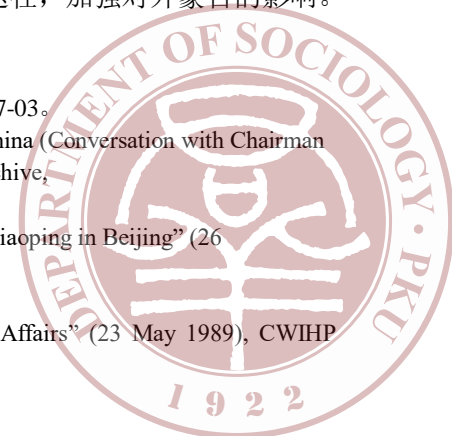
从 19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对外蒙古的态度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立场向“国家关系”立场的转变过程。上面的讨论说明，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并非顺理成章，而是尴尬和曲折的。在 1950 年代，中国多次向苏联表达收复外蒙古的意向，却屡屡碰壁。同时，中国在同蒙古的双边关系中尽施怀柔，以争取蒙古向中国靠拢。从现在解密的档案里可以看到，中共试图通过贸易、援蒙、文字改革等途径，加强对外蒙古的影响。这一策略引起了苏联的强烈猜疑，而蒙古当局则是另有因应。

¹ 《外交通报》，第 126 期（1964 年 9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1897-03。

² “Cable from Ambassador Katori to the Foreign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Visit to China (Conversation with Chairman Deng Xiaoping)’” (25 March 198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551>.

³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George H. W. Bush and Chairman Deng Xiaoping in Beijing” (26 February 1989),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507>.

⁴ “Information Note of Romanian Embassy from Beijing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3 May 1989), CWIHP Virtual Archive, <http://wwics.si.edu>.



首先造成苏联疑虑的是中蒙贸易关系的发展。1956年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一个报告提出，虽然中国领导人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看法。报告对中蒙贸易的状态颇感忧虑：“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为在蒙古购买的许多商品所支付的价格比苏联对外贸易公司更高，而同时卖给蒙古的中国商品价格要比蒙古从苏联买到同样这些商品的价格更低”。报告认为，只有消除中国领导人对蒙古归属问题的不合理想法，并且“要能组织好合作并协调好苏联方面和中国方面对蒙古的援助”，才能避免中蒙关系的不良发展¹。

只是中苏协调并不容易，因为蒙方也有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驻华大使馆1956年的工作报告提到，在过去几年里，蒙古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得特别快，从1951到1956年几乎增长了八倍。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取得很大增长的唯一国家”。关于蒙古对华和对苏贸易差价的问题，报告提到中蒙两国的贸易组织在1956年达成一项协议，“取消了过去贸易中所存在的价格不正常情况”²。但是实际上，情况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1957年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在蒙古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已占15%以上。同时，在蒙古对外贸易中出现了个零和现象，即“由于蒙古出口能力的局限性，只得靠缩减苏蒙贸易规模来发展它与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蒙古增加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积极性在于，“人民民主国家为蒙古大部分出口商品支付了比苏联更高的价格”。报告特别提出中国对蒙古实行的优惠价格政策，并称这已造成对苏联不利的政治后果，使蒙古内部的敌对份子得以利用这种情况来进行破坏苏蒙友谊的宣传³。

苏联所担忧的这种情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在1952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经济和文化合作协议的时候，毛泽东和泽登巴尔有过这样一番对话⁴：

毛泽东：美、英等帝国主义始终在剥削着殖民地和弱小国家。例如，我们给锡兰出售的白米是一吨54美元，而美国是卖80美元，资本家就是如此剥削小国的。

泽登巴尔：资本主义地区始终是在相互竞争，剥削小国。他们就如大鱼吃小鱼，利润就是一切，把帝国主义都消灭了才好呢。

毛泽东：你说得对，我同意！比如，锡兰就曾派代表来我国，要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我们的米价比美国便宜三分之一。他们每吨米卖80美元，我们是54美元，相当于22英镑。我们的香蕉也便宜，一吨才22英镑，美国却是32英镑。我们的贸易部刚同锡兰签订了贸易协议。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是，我们把社会分为两个阶级。从各国的情况来看，都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分为两个派，比如，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及以锡金、缅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大国在剥削小国。……危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国家，绝不存在争夺市场的矛盾，我们之间是物品的交换，资本家之间的争夺变得愈益激烈了。而且，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蒙、中等国的人民建立了自己完全独立的国家，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冲突是长期存在的。

毛泽东对诸如大米、香蕉的价格这样的细节如此熟悉，显然是事先特意做过了解。虽然他向蒙古代表团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行为的区别，但是在后来几年中，中国对蒙古的贸易政策突显的是中国与苏联的区别：中国不是“大国在剥削小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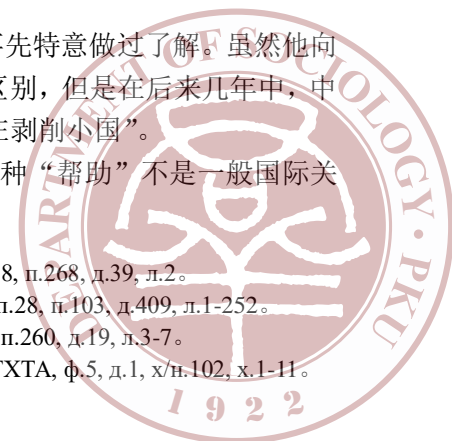
1950年代，中国在同蒙古的经济关系中奉行“帮助”政策。这种“帮助”不是一般国际关

¹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7月28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48, п.268, д.39, л.2。

²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252。

³ 《库普里科夫给费德林的报告》（1957年9月16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39, п.260, д.19, л.3-7。

⁴ 《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时的谈话纪要》（1952年10月4日），МУГХТА, ф.5, д.1, х/н.102, х.1-11。



系中的经济援助，甚至有异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援助。这是一种在中共特定的历史理念下的“帮助”行为。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对蒙古领导人做过这样的表示：“中国人三百年来剥削蒙古人，欠了蒙古一大堆的债。所以当中国站稳后，蒙古就可以要求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中国将在三百年内偿还蒙古的债”¹。1958年底，周恩来在同蒙古政府代表团谈话时，采用了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为蒙古的未来描绘了一个美好愿景²：

我们有义务帮助蒙古，从历史上比起来我们欠债欠得多。……历史上你们也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我们汉人筑了长城不让你们向南边来，而且还把你们往北边赶，赶到大沙漠的苦地方，好地方都被汉人占了。……现在我们经济建设发展了应该偿还你们，毛泽东主席讲过这叫还债，过去中国商人高利贷剥削了你们，今天我们加倍奉还。我们应该帮助你们，将来我们科学发展了还会有更大的帮助，如把沙漠变成绿洲，有水有树，科学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与毛泽东的“三百年”框架不同，周恩来讲的“历史”显然是清代以前，那时的“蒙古”并无内、外之分。周恩来对“蒙古”的说法，反映了1950年代中共对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策之间的某种联系。总之，中共领导人讲到的“历史上的剥削”和今后的“还债”，暗示的都是用新的方式延续中蒙在历史上的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债”和“帮助”也是1950年代中共对国内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概念。比如，1953年8月，周恩来同华北、内蒙古地区领导人谈及规划绥远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的问题，提出“承认自治当然就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汉人得天独厚，开风化之先，先进就应该帮助落后”³。同年10月，毛泽东对到京参观访问的几个藏区代表团强调：“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⁴。1957年8月，周恩来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还债”和“帮助”概念做了充分的说明。在讲话中，周恩来把独立多年“并且背后有一个苏联的帮助”的蒙古，看作是一个既没有发展又没有改变经济基础的失败案例⁵。苏联对蒙古“帮助”的失败，不仅与中共“帮助”国内少数民族发展的方针形成对照，而且也是未来中国取代苏联成为蒙古发展主要助力的根据。换言之，对中共而言，1950年代的中蒙经济文化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一般交往，而是修复中蒙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关系，并对苏联进行竞争的重要途径。

四、彼此之间

蒙古对中国“还债”式的“帮助”政策，大概是怀有一种忧喜参半的心情。在1958年同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的一次谈话中，蒙古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曾德表示，在独立了三十多年以后，原来落后的蒙古在最近几年发展得更快一些，这得益于所有朋友的全力支持，也包括“情况有点复杂”的“南面邻居”，即中国⁶。所谓“情况复杂”，表述的是蒙方对中共领导人意图的担忧。其实，在当时的中蒙经济关系中，双方都是相互猜忌和各有所图。这在中国的援蒙人员问题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1950至60年代，援蒙人员问题，即中国以提供劳动力的方式援助蒙古建设，是中蒙之间争

¹ 〈莫洛托夫与曾德会谈纪要〉。

² 〈周总理接见蒙古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2月26日），МУУТА（蒙古国中央档案馆），ф.310，д.1，х/н.13，х.15。

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20。

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181-82。

⁵ 〈周总理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草稿）〉（1957年8月4日），四川省档案馆，建川001-01-1061。

⁶ 〈莫洛托夫与曾德会谈纪要〉。



议最大的问题之一。1960年代末，蒙古外交部的一个内部报告这样概括说¹：

中国领导人以给我们提供劳动力为契机，从1955年开始将汉人移居我国，组织采取延长汉人在蒙古工作期限，禁止派遣蒙古族工人到蒙古工作，敦促汉族工人与蒙古公民结婚等措施，企图使中国工人成为蒙古公民。这一谋略以帮助增加我国人口为借口，得到稳步而有力的推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把在内蒙古实行的对蒙古族的汉化策略扩展到我国做好准备。不过，我国政府及时发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谋略，并采取了有效对策，使得他们的谋略没有成功。

显而易见，这是在中蒙关系恶化以后，蒙方对中国派遣工人援蒙的一种“阴谋论”叙述。问题的定性往往随着观念的转移而改变。1960年代末，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蒙方的观念已经带有强烈的仇华、恐华色彩。因此，上述引文体现的主要是蒙方在仇华理念下对有关事实的一种解说。

不过，在1950和60年代，“民族关系”一直通过援蒙人员问题在中蒙之间时隐时现，所以也不能将蒙方的指责简单地说成是无端的污蔑。谷继坤的研究大概是目前对有关历史情况所做的最详尽的探讨²。只是该文对中蒙之间族际关系的讨论，仅限于指出蒙方在接受和安排汉族工人时的疑虑，以及中方拒绝蒙方关于大量派遣内蒙古的蒙族人员赴蒙援建的要求。实际上，援蒙人员问题恰恰反映了1950年代中蒙之间国际、党际、族际关系交织的复杂情况。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中方究竟是否怀有一种意图，即希望通过大量派遣汉族工人赴蒙，藉以改变中蒙关系的性质或结构？目前的资料仅能勾勒出双方有关交涉的一个大致情况。

中国援蒙人员的派遣是海外华工大历史的一部分。但与历史上一般的旅外华工，甚至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派技术、劳务人员有所不同，中蒙双方在中国援蒙人员问题上的行为，都具有“复土主义”（irredentism）的成份³。前述“大蒙古”和“大中华”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蒙两国政府对援蒙人员政策的制订。就如中共领导人在1950年代一直怀有收复外蒙古的愿望一样，蒙古领导人同样怀有尽量吸纳蒙古境外的同族人的愿望。对双方来说，中国援蒙人员的派遣或许是实现彼此愿望的一个机会。这里提出一个带有悖论意味的假设：1950年代中蒙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兄弟国家”或“兄弟党”关系，使得双方都没有放弃将对方的领土或人民纳入自己的“民族统一”的要求；而随着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中蒙党际关系的恶化，反而成为重新构建中蒙之间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必要前提。1960年代以后中蒙的敌对状态，消除了双方对同一阵营的归属感，也终止了相互之间对领土和人民的统一要求。这是对中蒙关系在冷战期间发生变化的一般假设。对中国援蒙人员问题的求证，可以为这个假设提供一个例证。

中共建国之初，中蒙双方即开始商讨中国向蒙古提供劳动力援助的问题。以中国之有余补蒙古之不足，最初显然是互惠互利的做法。但是在双方的讨论中，援蒙人员很快就具有了变相移民的色彩。以劳动力援蒙的主意出自中方，而中国援蒙人员在蒙古定居则是蒙方的要求。1954年11月，乌兰夫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向乌兰夫提出，希望中国的援蒙工人可以作为永久居民留在蒙古⁴。次年，在双方进一步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时，蒙方又提出要求，中国工人的“工期越长

¹ 蒙古国外交部第一局：〈按照协议来蒙古国的中国工人的有关事项〉（1968年7月7日），МУГХТА, ф.5, д.2, х/н.402, х.121-26。

² 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页49-62。

³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17, 83-85.

⁴ “Record of Conversation with Prime Minister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Comrade Tsedenbal. (Fragments)” (29 November 195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479>.



越好，甚至定居下来”¹。中方对这个要求也欣然接受。1958年，周恩来在同蒙古政府代表团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中国工人“留下增加你们的人口，我们同意”²。

发生于1950年代中蒙之间的“援助”式移民动议，是“大蒙古”与“大中华”思想博弈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场博弈的开场锣，是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迄今见到的有关这次谈话的材料有三种：（1）中方公开发表的谈话记录；（2）蒙古档案里的一份简单纪要；（3）俄国档案里蒙方向苏方的有关转述。

根据中方记录，在毛泽东同蒙古代表团团长、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达姆巴（Дашийн Дамба，又译丹巴）的谈话中，谈到蒙古经济发展问题时，鼓励蒙古牧业向定居改变，同时要发展农业、水利。毛泽东强调，发展水利工程，“财力还不算那么重要，最重要、最要紧的是人力”。根据毛泽东当时了解的情况，蒙古共有80万人口。他提出的中国人力援助格外慷慨：“以后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10万，也可以是20万，甚至也可以达到30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引文中的底线为笔者所加，下同）”³

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Пунсалмагийн Очирбат）向乌兰巴托发回一份会谈纪要。这个纪要在传达毛泽东谈话的一个要点时，在措辞上与中方的记录有所不同。在蒙古大使的纪要里，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派遣10至20万工人。如需要牧民也可以去。你们与内蒙古建立关系，如需要也可以建立合作组织”⁴。

当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个蒙古官员是曾德。他在1958年2月向莫洛托夫转述了毛泽东的谈话，其中有关中国人力援助的内容，与上述两个文件不相同：“毛说，三百年来，中国人欠了蒙古很多的债。中国将满足蒙古的要求，来偿还三百年来来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向蒙古提供20万名劳动力和10万名畜牧工人。（曾德说）我们那时请求，从内蒙古给我们提供15,000名畜牧工人。但是，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后，这一建议被拒绝了。中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从内蒙古提供畜牧工人，（作为替代方案）中方愿意以任何数量的中国工人作为交换”⁵。

上述三种材料的划线部分，差别十分明显。在中方公布的材料里，毛泽东确实鼓励蒙古与内蒙古建立文化联系，但在讲到援蒙人员时并没有表示向蒙古输送蒙族牧业人口的意思，只是说在援蒙的几十万农业人员中，有一些人可以帮助蒙古发展畜牧业。而来自蒙古和俄国的档案材料则显示，毛泽东的谈话涉及两类援蒙人员，即“中国工人”和“内蒙牧工”。曾德的事后陈述似乎表明，在同毛泽东会谈后，蒙方又就牧工问题同中方进行了专门的沟通，但没有结果。毛泽东在1956年会谈时究竟是怎样说的，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但是在中国政府拒绝向蒙古输送内蒙古的牧业人口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误会的。蒙方数据显示，毛泽东在1957年5月20日致信蒙古领导人⁶：

您所希望的将一批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人迁徙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内蒙古自治区870万人口中汉族人口占700万左右，蒙古族人口却只占100万。正

¹ 〈拉哈姆苏伦与中国驻蒙大使吉雅泰谈话记录〉（1950年9月1日），МУГХТА，ф.5，д.2，х/н.58，х.69-72；〈关于国务院关于动员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通知和指示及相关报告〉（1955年1月28日至3月26日），附件，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048-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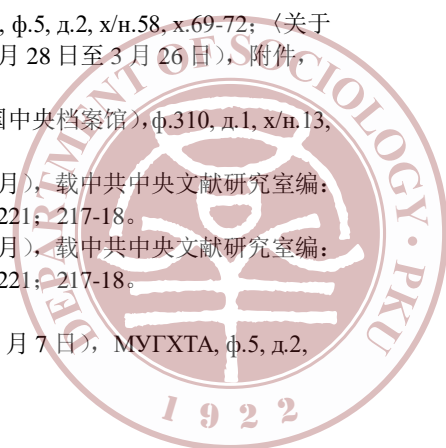
² 〈周总理接见蒙古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2月26日），МУУТА（蒙古国中央档案馆），ф.310，д.1，х/н.13，х.15。

³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1956年9月、12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17、221；217-18。

⁴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1956年9月、12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17、221；217-18。

⁵ 〈莫洛托夫与曾德会谈纪要〉。

⁶ 蒙古国外交部第一局：〈按照协议来蒙古国的中国工人的有关事项〉（1968年7月7日），МУГХТА，ф.5，д.2，х/н.402，х.121-26。



因为如此，给蒙古国派遣劳动力与技术支持这一工作，我国计划只能对汉族人进行宣传和倡导。依照我们的计划，近几年每年派遣几千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无法用蒙古语沟通，对你们生活和风俗习惯无法适应，会比较复杂麻烦的话，那么我们这方输送少数工作人员或不输送都可以。

虽然中共领导人作了如此明确的表态，蒙古政府在以后几年中依然十分执着地试图吸纳境外、主要是中国的蒙族人口。1962年12月，泽登巴尔到北京签署《中蒙边界条约》，其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即使在这种气氛下，泽登巴尔仍然当面向周恩来再次要求从内蒙古向蒙古输送人口¹：

目前，我们的劳动力需求量很大。周恩来同志您昨天提到我国需要提高人口数量。我知道您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有效利用工人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能给补派按协议应提供工人数的空缺部分。这是我们双方的相关机构会同解决的问题。考虑到语言沟通方面的因素，空缺部分也可以从内蒙古征召嘛。我们是不会在意的。这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不是出自民族主义的考虑。如您所知，几年前，我们党中央曾致函贵党中央，希望从中国迁移一定数量的蒙古族人口。当时提的人数是十多万。但是，当时你们回复说只能给提供少数的翻译人才，不可以迁移蒙古人口。也许贵国有自己的难处或有特殊原因。我们不知道这个难处或特殊原因是甚么。我相信你们不会把我的上述要求看做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

谈话中提及的所谓“语言沟通”问题，指的是当时在蒙古的中国工人与蒙古当局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语言障碍是国际劳务输出的题中应有之义，发生于中蒙劳务关系中毫不奇怪，但这应该不是蒙古当局力求从内蒙古输入蒙族人口的原因。中蒙之间出现的所谓劳务人员问题，除了蒙古确有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外，其实就是中蒙双方都十分明白的“民族人口”问题。如前所述，用吸纳内蒙古人口来扩大蒙古的人口总量，是二战以后蒙古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泽登巴尔急于撇清蒙古方面的要求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听起来像是此地无银之辩。1964年，蒙古领导人坚持不懈，再次正式要求中国政府“从内蒙古派遣畜牧业方面的一部分劳动力支持我们”。这次提出的数字是派遣一万牧民到蒙古居住和工作，为期三到五年或更长时间²。但这个要求依然是毫无结果。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际关系的一个特征，就是各个执政党的政策行为，经常表现出国际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要求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对于苏联来说，“国际主义”往往是维系其在阵营内部主导地位的一个说辞。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际主义”则常被用来作为本国寻求某种历史公正和独立地位的根据。中蒙之间有着漫长复杂的历史，双方在相互关系中尤其会强调自身行为的“国际主义”正当性，同时又无法摆脱同民族主义的干系。1950年代中国的援蒙政策，自然是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1955年中国国务院就动员工人赴蒙援建下发给有关省市的指示这样说明援蒙的意义：“蒙〔古〕30年来在苏联帮助下在经济文化建设等成绩突出，但是，蒙〔古〕缺乏人力和技术，本着加强中蒙两个〔国〕人民友好互助的精神，对于蒙〔古〕的困难，给予同情和帮助。这是我国人民的一个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光荣任务”。³

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氛围里，用“国际主义”的“光荣任务”来动员国内一般劳动群众远赴他国，自然在情理之中。但在前述毛泽东同蒙古领导人的谈话中，他提议向总人口不足百万的邻国输送二十至三十万的汉族移民，就显得过于慷慨了。对蒙古领导人来说，如此巨大数量的汉

¹ 〈泽登巴尔与周恩来谈话纪要〉（1962年12月26日），МУГХТА, ф.5, д.1, х/н.816, х.1-20；〈周恩来总理同泽登巴尔主席第一次会谈记录〉（1962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159-03。这两份中蒙档案在行文上略有不同，中方记录没有包括几年前双方就内蒙古人员问题通信的事实。

² 〈周恩来总理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鲁布桑谈话记录〉（1964年10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暂缺。

³ 〈关于国务院关于动员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通知和指示及相关报告〉，附件。

族移民绝难接受，就像中共领导人不能接受向蒙古输送中国的蒙族人口一样。北京和乌兰巴托相互之间既不能接受对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同时又猜忌对方的“民族主义”打算。这种尴尬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蒙早已形同两国，殊非一家，但是在“共产主义国际关系”的模糊愿景之下和冷战时期阵营政治的框架里，两国领导人往往把两国的事情当成自家之事来办。

中方对蒙古的移民动议，必然引起苏方的注意。苏联驻华大使馆 1956 年的工作报告提到，“中国同志具有向蒙古迁移很大一批中国公民的计划”，但由于蒙古政府的“含糊立场”，双方对这个问题尚无定论¹。苏联领导人从这里嗅出了令他们不安的味道。1956 年 2 月，在泽登巴尔和米高扬之间有一次关于苏联援蒙问题的谈话。米高扬告诫蒙方，在铁路等基本建设方面，不要寄希望于仰仗昂贵的苏联工人；同时，蒙古应该造就自己的工人阶级，不应打算从中国搬来一个工人阶级。米高扬也向泽登巴尔询问了蒙古和内蒙古的关系，而泽登巴尔则表示除了文化关系以外，别无其他²。

以后苏方又持续了解到中方对蒙古人口问题的态度。比如，在 1959 年 10 月末的一次谈话中，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对莫洛托夫说，蒙古人口稀少是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大阻碍，不增加人口就无法指望蒙古的变革会产生重大成果，而中国可以帮助蒙古摆脱这一困境³。后来莫洛托夫又从泽登巴尔那里了解到，在 1960 年 5 月周恩来访问蒙古时，随同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同蒙古官员谈话时提出，蒙古应该尽快发展人口，“为了更快地推动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蒙古的人口应至少不少于 1 亿人”。据说，当时蒙古领导人都对陈毅的说法感到震惊，并表示不能同意⁴。

如前所述，1960 年代后期中蒙关系破裂以后，蒙古政府选择性地忘记自己积极寻求内蒙古移民的历史，而将中国对蒙古提供劳务援助的政策称为“民族主义”的“谋略”。于是，中国领导人在 1950 年代所做的一系列支持中国劳务人员在蒙古定居的表态，也就变成了蒙古当局揭露中国“阴谋”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蒙方吸纳内蒙古人口的企图比较容易解释，但是中方的政策动机就不那么简单；大概不能一言以蔽之，或界定为中国政府所弘扬的“国际主义精神”，或看成是蒙古当局所谴责的“民族主义谋略”。目前，中国档案史料的开放情况还不足以让历史研究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这里仅提出值得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蒙古人口（劳动力）问题的考察要有足够大的历史时间框架。近现代以来，人口稀缺一直是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时至二十一世纪，蒙古仍在设法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⁵。在 1949 年以前，清政府和苏联当局在蒙古的不同经营，都对蒙古人口的发展趋向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评判中共领导人在 1950 至 60 年代对蒙古人口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应该采用自清代以来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长的历史框架，这样可以比较中共与清政府及苏联在相关政策方面的异同⁶。

第二，对中共领导人政策理念的复杂性要给予充分考虑。中蒙历史关系的继承与中断、中国

¹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1957 年 4 月 22 日），ABIPΦ,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252。

² “Excerpts from Tsendenbal’s Diary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Soviet Leader Anastas Mikoyan on Soviet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Ai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Fragments)” (24 February 1956),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480>.

³ 〈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1959 年 10 月 22 日），ABIPΦ, ф.0111, оп.41, поп.10, пап.260, л.25-33。

⁴ 〈莫洛托夫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1960 年 6 月 1 日），ABIPΦ, ф.111, оп.42, поп.5, пап.264, л.51-56。

⁵ 霍文：〈蒙古实施积极人口战略〉，《人民日报》，2007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

⁶ 有关研究参见成崇德：〈清代前期对蒙古的封禁政策与人口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关系〉，《清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页 26-31；张增智：〈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的历史与现状概述〉，《西北人口》，1995 年第 1 期，页 10-22；Thomas Spoorenberg,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Fertility Change in Mongolia: Impressive Fertility Rise before Continued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ic Research* 33 (October 2015): 841-70; Morris Rossabi,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25-45。

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型、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理念、冷战阵营的国际态势、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政策和跨界蒙族问题的关系，以及对内政外交的通盘考虑，等等，都可能是影响中共的劳务 / 人口援蒙政策的因素。

第三，对中共的蒙古移民政策的研究，还需要同中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政策进行对比。这样的比较研究可能会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例如，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底，北京应朝鲜政府要求，共向朝鲜输送了一万多户、五万多人口¹。到了 1963 年，中国政府又把向朝鲜移民的问题提到反对“苏修”的高度，要求相关各省、区做好工作，以加强同朝鲜的团结²。据沈志华的研究，中国向朝鲜输送朝鲜族人口，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即已开始。这种移民政策既带有对朝鲜的“民族关怀”，又带有反帝反修的“国际主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北京在朝鲜族人口问题上表现的“慷慨”，对中国自身边境地区的稳定并非有益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对蒙族人口的“吝啬”。至于个中原因，尚待史料完备以后的进一步研究。

五、“新”、“旧”有别

与贸易和移民问题相比，内蒙古的文字改革问题，在中蒙关系中并没有引起任何争吵，但实际上更为敏感。蒙古使用多年的斯拉夫化的蒙文，在蒙古的民族认同、文化教育和国际沟通诸方面的功能，论者均有述及⁴。对这种“新蒙文”的利弊无论怎样评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它是苏联对蒙古控制、影响多年的结果。同时，新蒙文也是表明蒙古与内蒙古不同的现代发展道路的最重要文化符号。由于笔者不具备研究蒙古文字近现代发展问题的能力，在这里只能提请学界注意，在 1949 年以后有关中蒙关系的档案里，这个问题显示出相当的重要性。

1956 年毛泽东同蒙古代表团的谈话里提到了文字问题，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中蒙之间的“帮助”关系反过来了。达姆巴告诉毛泽东，由于“新文字”的使用，现在蒙古的成年人都识字了。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并说内蒙古也在那样做。达姆巴的回应是：“在文字方面，我们可以帮助内蒙古”。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许，并鼓励蒙古与内蒙古建立“直接联系”⁵。这次谈话显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次年 4 月，苏联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中蒙〕两国在文化领域合作发展顺利。该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是，过去一年里，中国同志对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接文化联系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比如，1956 年访问蒙古的大多数中国文化代表团均来自于内蒙古。赴中国的部分蒙古文化代表团同样也只限于参观内蒙古自治区”⁶。

但是，蒙古政府帮助内蒙古引进新蒙文的方案很快就中途夭折。在苏联和蒙古专家的帮助下，

¹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ummary Report on Organizing Ethnic Koreans and Mobilizing Korean Immigrants to Go to Korea to Take Part in Construction’” (10 December 1959),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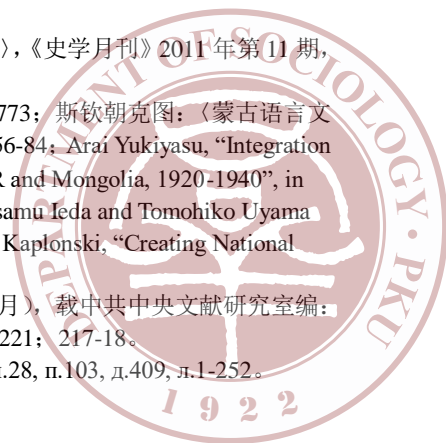
² “Instructions from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n Handling the Issue of Ethnic Koreans in the Northeast Going to Korea” (8 August 1963),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326>.

³ 沈志华：《东北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新中国政府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史学月刊》2011 年第 11 期，页 69-84。

⁴ 参见阿泽吉尔嘎拉：《20 世纪苏联对蒙古国的影响》，www.academia.edu/35593773；斯钦朝克图：《蒙古语言文字及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蒙藏季刊》卷 22（2013 年 3 月），页 56-84；Arai Yukiyasu,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Language’: Language Policies of Mongolian Peoples in the USSR and Mongolia, 1920-1940”, in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lavic Eurasia and Its Neighboring Worlds*, ed. Osamu Ieda and Tomohiko Uyam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6), 309-34; Christopher Kaplonski, “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Socialist Mongolia”, *Central Asian Survey* 17, no. 1 (1998): 35-49.

⁵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1956 年 9 月、12 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 217、221；217-18。

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1957 年 4 月 22 日），АВІ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252。



内蒙古、新疆分别从 1955 和 1956 年开始，逐步试行推广斯拉夫化的新文字¹。按照参与该项工作的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Г. П. Сердюченко）的论证，在内蒙古用西里新蒙文取代“旧蒙文”的益处有三：中国可以立刻分享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语和苏联布里亚特语的出版物；可以从苏联获得先进的印刷、打字设备；尤其是可以避免其他方案如文字拉丁化带来的弊病，即“人为地把中国蒙古人跟那些在社会政治、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已经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蒙古人隔离开来”²。然而，到了 1958 年，苏联专家提出的内蒙古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都向北倾斜的论证方式，被中共转换成了一个向南、向汉族靠拢的论证，其中心目的就是实现苏联专家所认为会产生弊病的文字拉丁化。1958 年 1 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的一次报告会上提出³：

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的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许多兄弟民族都表示这样的愿望，就是要同汉族在字母上取得一致，以便于交流文化、学习汉语和吸收汉语的名词术语。……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在周恩来讲话之后，内蒙古、新疆先后于同年 3 月和 6 月终止了文字的斯拉夫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很快就按照周恩来讲话的宗旨，制订了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斯坦文拉丁化的改革方案，而内蒙古则干脆停止了文字改革。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一面在全区掀起一个学习旧蒙文的热潮，一面对急于同汉族“融合”和轻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倾向展开批评⁴。乌兰夫亲自挂帅，指责“有的蒙古同志还认为学习蒙文是狭隘民族主义，用处不大。甚至有的把不学习蒙文自认为是‘积极’，……而这种‘积极’是裸体跳舞，是脱离群众的，必须彻底纠正”。⁵

苏方当时的观察是，中国政府在 1957 年末或 1958 年初决定停止引进新蒙文的工作，是因为在新疆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将文字斯拉夫化变成了同中共中央抗衡的工具⁶。蒙方则认为，中国领导人改变做法的目的是隔断中国的蒙古族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其实，1950 年代蒙古同内蒙古文化关系的增进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就是引起蒙古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党政领导人，主张在蒙古恢复旧蒙文⁷。

迄今见到的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都将 1950 年代末以及后来在内蒙古和新疆文字改革中出现的反复，归咎于所谓中共政策的“极左”偏向或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⁸。1957 年下半年，中共在进行反右运动时，确实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展了一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整风运动。但是在中共认定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几个主要表现当中，并没有涉及文化教育方面⁹。乌兰夫大力

1 色·贺其业勒图：〈论乌兰夫贯彻民族语文政策的措施体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页 7；陈云华、王春燕：〈当代新疆两次重大文字改革刍议〉，《语言与翻译》，2002 年第 1 期，页 28。

2 转引自周庆生：〈文字改换与社会政治变迁：中苏两国中亚地区透视〉，《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 年第 1 期，页 178-79。关于谢尔久琴科在华期间的活动及影响，参见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 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页 550-53。

3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 年 1 月 10 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 288。

4 陈云华、王春燕：〈当代新疆两次重大文字改革刍议〉，页 28；周庆生：〈文字改换与社会政治变迁〉，页 180-81；色·贺其业勒图：〈论乌兰夫贯彻民族语文政策的措施体系〉，页 8-9。

5 乌兰夫：〈一九五九年的任务〉，载《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础数据》，页 173。

6 “Iu. Andropov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On the Struggle with Lo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5 February 1958),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75896>.

7 〈莫洛托夫与曾德会谈纪要〉。

8 陈云华、王春燕：〈当代新疆两次重大文字改革刍议〉，页 30；周庆生：〈文字改换与社会政治变迁〉，页 180-81；色·贺其业勒图：〈论乌兰夫贯彻民族语文政策的措施体系〉，页 9。

9 〈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7 年 10 月 15 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提倡旧蒙文，在当时也没有被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标签。显然，在中国的有关档案解密之前，不可能对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改革政策，尤其是涉及同苏、蒙比邻而居的内蒙古和新疆的情况，做出切实的分析。

然而，以上简述显示出，内蒙古的旧蒙文改革牵涉到太多的问题，中、蒙、苏当局都有利用各自的文字改革方案来达到政治目的明确意向。在中共内部，在位居北京的中央和内蒙古地方政府之间，也进行着民族政治的博弈。因此，本来似乎是民族身份天然标志之一的语言文字，在中国“不断革命”的年代，变成了改革的对象，并且是一种可以按需要而调整的政治模具。对外，蒙文改革担负着塑造中国及内蒙古同苏、蒙的政治文化关系的重任；对内，蒙文改革与否及其走向，又变成了衡量内蒙古民族同汉族、同中华民族关系的一个尺度¹。

总之，文字、文化交流和劳务交流一样，是中蒙之间试图相互渗透、影响的领域。不同的是，劳务交流导致在蒙古的中国工人卷入了一些法律纠纷、罢工事件，甚至造成人命伤亡，而文化交流则可以在学术讨论甚至载歌载舞的平和气氛下进行²。1962年12月中蒙两国签订边界条约期间，在周恩来和泽登巴尔之间有过一次有关文字改革的对话，摘录如下³：

周恩来：我们是两个邻邦，有传统关系，所以有共同的话语。这在有文化关系的国家之间是很正常的现象。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同苏联有广泛的联系，你们就学习了他们的经验，导入了新的文字字母。这使得蒙古文中有了很多苏联科学技术词汇。同样的道理，内蒙古的蒙古文中也有很多汉文的名词术语，也因此在内外蒙古的蒙古文中出现了不少互不关联的名词术语。

泽登巴尔：语言不会成为蒙古人的障碍。我们的旧蒙古文历经几百年，很好地履行了其历史使命，但现在有点赶不上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就导入了新字母。

周恩来：虽然导入了新字母，但蒙古语文还是给保存了下来。内容上有甚么新的充实和革新没有。

泽登巴尔：现在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路上。这需要各国在语言文字上要发展共性，并最终要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

周恩来：每个国家都需要从对方的语言文字中汲取营养。发展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准备用拉丁字母标注汉字。不过，这需要下大功夫。

两位领导人这番谈话的意识形态框架是共产主义大同。泽登巴尔显然自诩蒙古在共产主义阵营“书同文”的方向上，比中国占有更领先的地位。而此时双方对共同意识形态的解说已经发生歧义，中共领导人对蒙古在苏联羽翼下的社会发展也早有微词。1950年代，在苏联、中国、蒙古、内蒙古之间一度存在着一种内外不明、你我不分的“兄弟关系”。而此时，中蒙两国之间领土的“硬界限”——国家边界——已经确定。在周恩来看来，两国之间文化的“软分野”也应与国家边界一致，内蒙古和蒙古的文化发展各有中心，就像各自文字的拉丁化和斯拉夫化一样，相互之间渐行渐远。而泽登巴尔则另有见解，相信“蒙古人”文化内涵的整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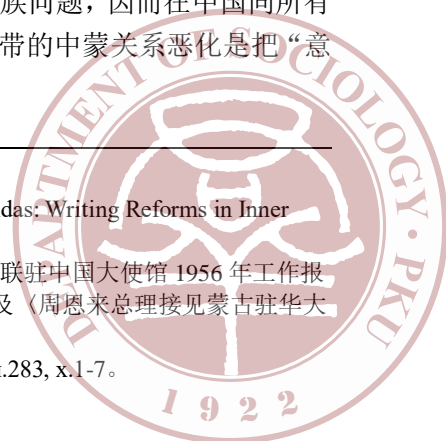
本文所立意讨论的中蒙边界问题，由于清代以后遗留的领土和民族问题，因而在中国同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中极具特殊性。以往有一种说法，即中苏分裂及其附带的中蒙关系恶化是把“意

页 269。

¹ 新近的研究参见 Anran Wang, “Between Communist Doctrine and Nationalist Agendas: Writing Reforms in Inner Mongolia, 1954-1980”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2017)。

² 有关中国工人在蒙古卷入纠纷的情况，中、蒙、苏档案都有记录。如前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蒙古国外交部第一局：〈按照协议来蒙古国的中国工人的有关事项〉；以及〈周恩来总理接见蒙古驻华大使色拉布谈话记录〉（1962 年 5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83-01。

³ 〈泽登巴尔与周恩来谈话纪要〉（1962 年 12 月 25 日），МАХИТА, ф.5, д.1, х/н.283, х.1-7。



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¹。其实，从近现代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民族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平、仇视乃至战争，都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的不同状态。在1950年代中、蒙、苏三国之间的党际关系处于“正常”状态时，中蒙之间的国家关系却处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正常”状态，所涉及的就是所谓领土“板块”或民族归属和民族认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三国之中成立最晚，在历经十年以后，三国之间由最初的“兄弟党”的相互热情转而反目成仇，而三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却因“兄弟分家”而开始正常化，标志性的发展就是确定中蒙两国各不相属的边界线。

【论 文】

中蒙划界史迹初探（下）

——从兄弟到邻居

刘晓原

《二十一世纪》编者按：本文第一至五节已于2020年6月号刊出；2020年8月号第180期刊出本文第六至十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划界问题²，是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如果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对蒙古独立在法律上的承认，就不会有中蒙划界问题；第二，中华民国承认蒙古独立的两个前提条件——1945年蒙古全民公投和按照中国地图确定领土范围，在对苏外交中仅实现了前者，这就给后继者处理划界问题时在法律和观念上预设了问题；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的国家观与中华民国有很大的不同，二者的历史性承接又将中蒙划界推迟了十数年。

六、兄弟阅墙

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中华民国与苏联展开了一场对中国和东亚的战后命运都至关重要的外交博弈。面对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的强权外交和苏军入华参战的强大压力，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接受苏联所要求的蒙古独立，希图以此换取战后同苏联的合作³。中苏谈判期间，蒋介石在给中国代表团有关放弃蒙古的最初指示中，根据当时国际政治推崇的民族自决原则和领土主权原则，提出蒙古举行全民公投，并以中国地图为根据确定中蒙边界⁴。在苏联政府看来，在蒙古举行全民公投是一个可控的过场，因此可以接受。

¹ 有美国内学者对中苏分裂原因的争论，参见栾景河：“‘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页33-45。

² 在本文中，“蒙古”即指中国人习惯称谓的“外蒙古”，有别于中国境内的“内蒙古”。

³ 有关1945年中苏谈判，参见 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8-86。

⁴ 〈蒋介石致宋子文转斯大林电〉（1945年7月9日），ABIPPO（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 оп.7, п.35, д.506, л.35-39

